

「後人類時代的科技與文學」特別講座： 日本科幻小說與戰後社會

時 間：107 年 12 月 9 日（日）13:30-1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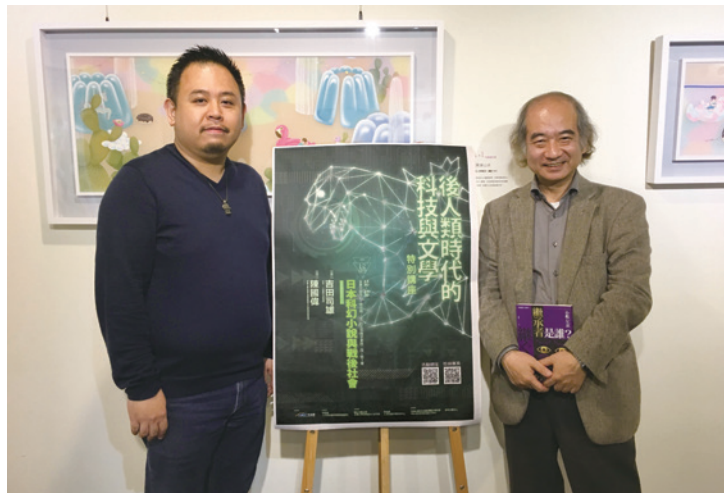
地 點：金車文藝中心·南京館

主 講 人：吉田司雄（日本·工學院大學教授）

主 持 人：陳國偉（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記 錄：王品涵（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要完成這篇 12 月 9 日在金車文藝中心的講座側記，需要穿過兩道自動門，走上三層樓後，打開手機錄音。自動門與手機，它們的靈感都源自於經典影集《星際爭霸戰》（*Star Trek TOS*）。然而，早在《星際爭霸戰》勇敢地飛向前人未至之地以前許久，《海底兩萬哩》（*Vingt Mille Lieues Sous Les Mers*）與《世界大戰》（*The War of the Worlds*）便已啟發了後來的工程師讓人類潛往深海與飛向太空的想像。而當人類已然可以立足放眼所及的所有實存空間之後，又出現了《潰雪》（*Snow Crash*）啟發了我們朝向虛擬實境邁進。科幻作家透過創作，擘劃出他們的願景。科學家與工程師則將這些狂想加以修正並付諸形貌，最終呈現出超乎原始想像的器物，滋養著新一代的奇想。



圖一：主講人吉田司雄教授（左）與主持人陳國偉教授（右）合影

科幻小說從概念上影響著我們的社會。然而，社會是否也在我們難以理解的層次上影響著科幻小說呢？答案顯然是肯定的。但，他們如何影響彼此？本次吉田司雄教授此一講座，核心即在解答此一疑問。於是首先的問題必然是，這一切如何開始？

一、一開始，日本沒有科幻

在日本，科幻小說與歐美一樣，以英文的「SF」作為類型名稱。所謂的SF，即「Science Fiction」的略稱。相較於其他的流行文類，如羅曼史、偵探推理等早在19世紀便已出現，現代科幻小說要到了1926年，才首次在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的科幻雜誌《驚奇故事》(*Amazing Stories*)中以「scientifiction」現身。三年後，在《科學奇幻故事》(*Science Wonder Stories*)創刊後，這個詞與其所指涉的文類才確定了下來。

因此，1920年代的日本嚴格來說是不存在「SF」這個文類的。現在會被歸類為SF的作品，當時其實被分在推理小說的「變格」(意指非正統)一類中，以「科學小說」的名稱而廣為人知，並且以當時偵探小說的重要刊物、由博文館出版的《新青年》雜誌為發表重鎮。像是被稱為「日本SF小說始祖」之一的海野十三，他初登文壇發表於此的作品〈電氣浴池怪死事件〉(電氣風呂の怪死事件)，便是偵探小說；而早夭的天才科幻作家蘭郁二郎和好友創辦的雜誌，也命名為《探偵文學》。凡此種種都顯示了當時的科幻小說家，自身其實缺乏「科幻作家」的意識，而傾向將自己視為偵探小說家。

那麼，科幻小說到底何時從偵探小說中分離出來的呢？時間要拉到戰後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1959年12月早川書房的《SF雜誌》(SFマガジン)創刊，這本刊載了眾多優秀的翻譯科幻小說的雜誌，令許多作家意識到科幻與偵探小說的不同，關於這方面的演進歷程，長山靖生的《日本SF精神史》有著詳盡的描述，相當值得參考。

二、「三神器」的時代：科幻小說與高度經濟成長期的日本

「SF小說」在日本廣為人知的時間點，正好是日本高度成長期的開端，廣為人知的電影《ALWAYS 幸福的三丁目》背景就是設定在這個年代的東京。在這個時間點，隨著經濟逐步復甦，現代家電也開始進入日本家庭，當時甚至出現了「黑白電視、冰箱、洗衣機」是「三神器」的說法。拿原先描述日本神話中的重要

神器來比喻今日的普通家電，顯示出這些電器對於當時的日本人而言是多麼的貴重。

在「三神器」中，電視應該是影響最大的吧。因為透過電視，可以很快地得知世界上發生了什麼事。當 1957 年蘇聯發射人類史上第一顆衛星「史普尼克 1 號」到太空中，而 1961 年蘇聯太空人尤里·加加林 (Yuri Gagarin) 成為史上第一個進入宇宙的人類時，整個世界都見證了太空時代的到來。

在這之後，宣稱目擊到 UFO 或外星人的人數開始大幅增加。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這些人看到的不明飛行物大多是圓形的，這是因為他們看到同一種外星人嗎？或者能飛越宇宙的設備就應該是長成這個樣子的呢？雖然因為人類還無法製造出這類設備，因而難以斷言，但我們可以先回溯到目擊情報第一次快速增加的 1940 年代。

三、不明飛行器一定是「飛碟」嗎？從「像陽光下彈跳的魚」開始的飛碟進化史

為什麼 1940 年後，突然出現大量目擊不明飛行物的報告呢？這和「肯尼士阿諾德事件」有絕對的關係。出生於 1915 年的肯尼士·阿諾德 (Kenneth A. Arnold) 是一名飛行員，1947 年 6 月 24 日，他在飛行的途中，看到有九個不明飛行物體從面前一閃而過。他降落後，形容這些不明飛行物體的形狀「扁平的像盤子」，而它們怪異的飛行軌跡則「像是魚在陽光下跳躍」或「小碟子飛躍彈跳過水面」。媒體很快地就將「碟子」和「飛躍」結合起來，創造了「飛碟」這個名詞，這個形象生動的名詞很快地就傳播開來，取代了「不明飛行物」(UFO)，成了更廣為人知的說法。

儘管「飛碟」的形象相當生動，但它畢竟只是一個飛行員以為自己可能看到的東西，本應不了了之。誰知道，就在幾天後的 7 月 4 日，發生了著名的「羅斯威爾飛碟墜毀事件」(Roswell UFO incident)。

「羅斯威爾飛碟墜毀事件」剛發生的時候，大眾其實相信軍方的說法，認為墜毀的不過是帶著雷達反應器、上面搭載著測試用假人的氣象氣球。然而隔年又發生了「曼特爾幽浮事件」(Mantell UFO incident)，漸漸地，目擊到不明飛行物的報告不僅增加了，目擊者所看到的形象也集中以圓盤的形象出現。換言之，被看到的飛碟越來越多了。

這些傳言與報導逐漸滲透進了好萊塢的電影裡，編劇們很快地替外星人安排了亮相的機會。1951 年，講述美國空軍與科學家在北極發現墜毀飛碟與外星

人屍體的電影《異世異種》(*The Thing From Another World*)，決定讓外星人擔綱邪惡大主角，在科學家研究外星人的途中，植物系的外星人被喚醒，開始大肆殺害人類。

但外星人也不用太難過，在同年上映的另一部科幻電影《當地球停止轉動》(*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中，乘著飛碟降落在美國的外星人，可是被暗喻為耶穌；而這兩部片都在1952年登陸日本(可惜不是搭著飛碟來的)。不管觀影大眾覺得外星人是協助人類進化的神，或是只想把人類當成食物的惡魔，在這些片子的推波助瀾下，大眾已經認定，只要是外星人，搭的一定都是飛碟，於是很快地，出現了號稱自己搭過飛碟的人。



圖二：「後人類時代的科技與文學」特別講座

四、「我是外星人的傳教士」：搭上金星飛碟的喬治·亞當斯基，與他的日本信眾們

這個搭過飛碟的幸運兒，是美國人喬治·亞當斯基(George Adamski)。1952年，他自稱在沙漠裡遇到了一個金髮的金星男子歐森(Orthon)，這名男子帶著亞當斯基去乘坐他的飛碟。「我們用手勢和心電感應溝通，他警告了我核子戰爭的危險性」。亞當斯基說，他倆顯然有一次愉快的交談，因為亞當斯基日後更進一步地表示，「這位金星居民的存在就像是對偉大的愛和理解智慧的溫暖擁抱」。亞當斯基自覺有責任將歐森的訊息傳播給地球人，他很快地展開了巡迴

演講，並在 1953 年出版《降落的飛碟》(*Flying Saucers Have Landed*)。這本書與其他的作品在日本大受歡迎，到現在，日本還能看到《亞當斯基全集》(附帶一提，最新版本的翻譯出版於 2011 年)。

在這樣的熱潮下，幽浮研究者荒井欣一在 1955 年成立了「日本飛碟研究會」(日本空飛ぶ円盤研究会)，這個研究會不僅人數眾多，會員裡甚至有三島由紀夫、石原慎太郎、星新一、系川英夫等知名人士。1957 年，日本飛碟研究會中的狂熱者組成了以「和搭乘飛碟來到地球的外星人友善交流」為目的的「宇宙友好協會」(Cosmic Brotherhood Association，簡稱 CBA)。

相對於認真想和外星人接觸的 CBA，原研究會的「科學創作俱樂部」則創辦了以幻想作品為主的同人雜誌《宇宙塵》。由於「塵」和「人」在日文中，都念作「Jin」，因此這個名字不僅指涉「宇宙人」(外星人)，還更進一步地認為無論是人或外星人，都不過是宇宙中的微塵。這本題名頗有深意的雜誌，並不認為外星人必定存在，然而，他們喜歡討論「如果」，如果外星人存在的話，他們會是什麼樣子？人類與他們的接觸會是什麼樣的呢？

在這樣的風氣下，《宇宙塵》最終孕育出被日本科幻界稱為「科幻御三家」的星新一與小松左京，三人裡唯一不是在《宇宙塵》出道的筒井康隆，也在雜誌上刊載了許多作品。換言之，日本科幻小說的成熟，與日本飛碟研究會的成立，可說是息息相關。

五、自海中泡沫誕生的不是維納斯，而是哥吉拉

1963 年，小松左京在《宇宙塵》上刊載了短篇小說〈和平的大地〉(地には平和を)。這部以平行世界(Parallel world)概念為軸心的架空歷史(Alternate history)小說，描述日本帝國並未在 1945 年投降，因而美國和蘇聯攻進了日本本土的故事。透過這部作品，小松左京要向社會提問的是，身為戰爭責任國的日本，在高度經濟發展下，將過往戰爭時期的痛苦拋諸腦後的想法是正確的嗎？

小松左京不是第一個問出這個問題的人，投射在日本的核彈，不只震撼了日本，就連發明者的美國，也滿溢著對核彈的恐懼。先前曾提到的電影《當地球停止轉動》中，就提及了外星和平使者要人類停止核能試驗，因為如果繼續下去，那麼人類會在核子武器為主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中滅亡。「外星人的傳教士」喬治·亞當斯基也堅持，金星人告訴他的重要訊息之一，就是停止核能相關試驗。

然而，儘管有原爆經驗在前，在美蘇冷戰的框架下，相關的試驗仍持續進行。1954年3月，美國在太平洋環礁發動了核子試驗「城堡作戰」(Operation Castle)，此次核子試驗相當出名，因為美國在第一次試爆的時候完全錯估了氫彈的威力，結果這個比投放在廣島的「小男孩」還要強1000倍的氫彈，使得在鄰近海域捕魚的上百艘漁船與環礁居民都發生了嚴重的輻射中毒，魚貨遭到核汙染，而環礁許多設施遭到摧毀。

在這些漁船中，有一艘是來自於日本的「第五福龍丸」號，受到輻射傷害的船員雖好不容易回到國內，但擔任無線通信長的保山愛吉，在半年後仍是因輻射傷害逝世。「第五福龍丸」號事件的發生，正好是日本和盟軍在二戰時爭奪的海域，而原爆的過程，則引發了日本國民對於大約九年前在廣島與長崎發生的原爆記憶，開啟了日本反核運動的契機。

在此一背景下，電影《哥吉拉》(ゴジラ)誕生了。1954年11月上映的《哥吉拉》，藉由隱射在當年發生的核災「第五福龍丸事件」，喚起了原爆的慘痛記憶，以此傳達反核、反戰的訊息。「哥吉拉」就像是原爆的亡魂藉此返回人間，提醒著日本人在高度成長期時亟欲遺忘的悲慘過去，並藉著這樣的記憶而獲得了類似遠古時期恐龍的形體。

儘管如此，日本仍在同年通過了核電預算。

六、喂！垃圾要掉下來啦！科幻小說對高度經濟成長期的省思

日本高度經濟成長期的象徵，就是1970年代的萬國博覽會。在這個博覽會上，日本展現了自身的科技實力——免治馬桶、手扶梯與罐裝咖啡，都是在此初次亮相，日後逐漸普及的產品。



圖三：吉田司雄教授講述二戰原子彈與日本科幻小說之關係

然而，高度的經濟成長，伴隨而來的是過度的消費，而過度的消費，必然跟隨著大量的垃圾，這些垃圾要丟到哪裡，成了此時期的一大問題。星新一的極短篇〈喂！給我出來〉(おーい、でてこーい)，正是在討論這個議題。故事裡，某天某地出現了一個深不見底的大洞，一個年輕人朝著洞喊了「喂！給我出來」，卻一點回音也沒有，顯見這個洞非常非常深。於是，苦於沒地方丟垃圾的眾人，開始往裡面傾倒廢棄物，因為怎麼也倒不滿，最後連核廢料也都丟了下去，直到過了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後，有一個人突然有一天，從空中聽到「喂！給我出來」……。星新一用這個狂想短篇，對「用過就丟」的消費社會提出了警告。

星新一的警告確實地成了真。在追求經濟發展而不關心環境永續的概念下，各種奇怪的疾病陸續出現——水俣病、四日市哮喘、痛痛病等，在研究後才發現是肇因於環境汙染的公害病一個個的出現。正如同星新一小說中那些終究會掉回人類頭上的垃圾，在公害病的威脅下，日本人才認識到科技並非是光明未來的保證。

七、「怪力亂神」的科幻小說：恐怖大王、神和外星人

1970 年代的日本，與科幻小說一起廣為流行的，是神祕學；當時，著名的預言家諾斯特拉達姆斯「1999 年恐怖大王降臨」的預言又重新流行了起來。1973 年，五島勉《諾斯特拉達姆斯大預言》(ノストラダムスの大予言 迫りくる 1999 年 7 の月，人類滅亡の日) 在石油危機與公害問題等令社會人心惶惶的時刻出版，大賣了 250 萬部，甚至於隔年改拍成電影。

為什麼神祕學也在這個時候廣為流行？英國科幻作家亞瑟克·拉克 (Arthur C. Clarke) 的「克拉克基本定律」(Clarke's three laws) 的第三項，是一個簡潔有力的解釋——我們無法區分超越時代的技術和魔法之間的差別。舉例來說，對於古人而言，拿著手電筒的現代人，肯定是神的使者吧，因為我們可以碰觸到光，卻不被燙傷。

那麼，神會是乘坐飛碟而來的外星人嗎？那些神蹟，會是「超越時代的技術」嗎？

亞瑟·克拉克的作品《童年末日》(*Childhood's End*) 便講述了這樣的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對日本科幻小說的影響非常大，「神／外星人」的主題，也因此成為日本科幻小說中相當重要的子題，光瀨龍、萩尾望都、山田正紀、山本弘等，都曾就這個主題發表過精采的作品。這樣的思想也不限於日本，1977 年的

《第三類接觸》(*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1982 年的《E.T.》，都是在此基礎上去思考人類如何與他者共存的問題。

等待未知生物的來臨，以及該如何與之共處，這正是科幻小說最大的基礎，由於面對的是未知，因此會有不安與恐懼。這其實正是對科技的完美隱喻，對於科技的發展，我們既期待便利，卻又恐懼反噬。機器人 Pepper 現身時的廣受矚目，與《從明天開始，你的工作都由機器人幫你做》(明日からあなたの仕事はロボットがやります)這類書籍開始販售的現象，在在說明了我們對未知既愛又怕的心理。

八、結語：科幻小說是人類矛盾心理的藝術結晶

從上面的社會脈絡來看科幻小說的發展，會發現日本在高度經濟成長期的同時迎來了科幻小說的黃金時期並非偶然，正是由於高度成長期間的科技越見發達，因而科幻小說的書寫與閱讀也越見蓬勃。科技的興起，促成了人們對未來的期待，也加深了人們對未來的恐懼，期待有多高，恐懼就有多深。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科幻小說得以滋長，透過將我們的夢想與恐懼化為文字，人類終得以藉此確認自身矛盾的心情——也許還能藉此釐清問題的癥結也說不定呢？

這是日本科幻小說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那麼，台灣科幻小說與社會的關係又是什麼樣子的呢？在講座的最後，吉田司雄教授表示，非常希望這場講座能引發聽眾去思考與研究這個問題。

這真的是一個很棒的研究議題，我決定在等「雅婷逐字稿」APP 幫我做講座紀錄的同時，來問一下新版 Siri——啊不，是 HAL¹ 了——的看法。嘿，HAL，幫我搜尋一下「台灣」、「科幻小說」。還有，你覺得剛剛這場演講怎麼樣？

¹ 典出英國科幻大師亞瑟·克拉克 (Arthur C. Clarke) 的科幻小說經典《2001 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是故事中執行木星探險任務的發現號 (Discovery One) 太空船搭載的超級電腦 HAL 9000 的簡稱，後來引發了一連串的事件，在整起任務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